

# 实体书店：从卖书到社交

■本报记者 张文静

6月22日,在位于北京科学院南路的融科资讯中心,被誉为“中国最美书店”的钟书阁开业。这个日均3500人次打卡的网红书店,成为南方书店纷纷北上入京的一个标志,也是如今实体书店遍地开花的一个缩影。

“北京好玩的书店太多了!”

“北京好玩的书店太多了!”这是三个月内遍访北京实体书店后,北京大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颖发出的感慨。

作为北京阅读季策划人,2018年借着全民阅读“一区一品”专项调研的机会,刘颖跟随业内专家和记者走访了北京各区的实体书店。在这个过程中,刘颖看到了很多散落在北京城市角落里的书店“珍珠”。

“西西弗书店的‘七十二间听课’儿童阅读体验空间,是真正属于孩子们的小天地;坐在正阳门箭楼的Page One书店里聆听来自国家大剧院乐手的演奏,那真是相当棒的体验;到了延庆北京世园会里的自然书店,你将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向往的生活。”刘颖说。

每到一家让自己感到惊喜的书店,刘颖就会发朋友圈,总能得到大量点赞,朋友们纷纷在图片下面问:“这是哪里?”这么多好玩的书店还不为人所知,想到这里,刘颖觉得有些遗憾,“不如将我们走过的书店变成一本指南,让更多人知道,找到。”

今年夏天,《北京阅读空间漫游指南》出版。书名中使用“阅读空间”,而非“实体书店”,除了书中还涉及一些特色图书馆外,刘颖说,这也体现了一种思维的转换。“我们不是去推选某种经济实体,而是强调一个能看书、能进行文化活动的空间,这个空间背后是当前实体书店对各种资源的整合。”

“如今,‘复合多元’已经成为北京各书店和图书馆的特色。从读者的角度来说,它更像一个休息的空间,生长的空间且可以漫游的空间。”北京大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策划经理、《北京阅读空间漫游指南》作者之一杨俊康说。

迎来一波开店潮

如今,走进一间书店,你会发现它的样子已经与传统书店完全不同。“以前我们怎么能想象到,书店里面还能跳舞?书店里面有画展?书店里面还能有现场演唱会?”杨俊康说。

这些创新之举让实体书店在近几年迎来了一波开店潮。

根据《2018~2019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2018年开店数量最高的大型连锁书店,年度新增店铺数量达到100家以上。2018年1至10月,西西弗书店、言几又书店和中信书店,分别以7.7亿元、5.5亿元、3.06亿元的综合营业额排名国内非新华品牌书店收入前三名。

时间回到八年前,实体书店远不是这样的光景。2011年10月,光合作用书房五道口店和现代城店在被供货商抢完货后,一片狼藉,大门紧闭,成为实体书店进入寒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此之前,书店行业已经嗅到了批量“死亡”的味道。那期间,第三极书局、风入松书店、席殊书屋、思考乐书局等曾名噪一时的民营实体书店先后陷入经营危机,纷纷关门或被收购。

“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实体书店传统的、以卖书为生的经营方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刘颖说。

此外,互联网的出现使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互联网二进制的数据传播,使知识的生成和消化都变得极其迅速。这是传统书店没办法赶上的。书店只能转型和升级。有什么是网络无法替代的?我们编撰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答案就是体验,是社交,是书香,是氛围,是在空间里漫游的享受。”杨俊康说。

2013年,刘颖开始协助北京阅读季办公室做整体策划。此后,她见证了实体书店的回春复苏。“全民阅读的推进,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城市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撑,老百姓对阅读的新需求,都是实体书店得以重新开张的理由。”刘颖说。

复兴不易,未来可期

迎来开店潮,是否意味着实体书店的全面复兴?刘颖和杨俊康都不这么认为。

“实体书店正处在一轮再造和改革之中,但离真正的‘复兴’仍差几步。‘外面’很热闹,但我们更关心书店‘里面’有没有生出一个崭新的运作模式。”杨俊康说。

“从整体上来看,实体书店的盈利状况还是比较差的。在大量补贴结束之后,还能留下多少家,还需要再观察。”刘颖说。

最新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2018~2019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西西弗书店虽10个月就获得了7.7亿元营业收入,但利润却并不多;参与调查的62家书店中仅有1家只通过销售图书盈利。

但在刘颖和杨俊康看来,实体书店仍有巨大的市场可挖掘。

“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在家里点点手指就能用VR看到街景的今天,实地探索仍然有它独特的价值。实体书店是文化地标、社区的氛围、城市的精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实体书店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可以用知识和文化‘社交’的地方。在通州,有一位妈妈在网上买了一屋子的书,自己看完觉得可惜就开了一家绘本馆,讲故事、听故事、分享故事成为她这个空间里主要销售的产品。这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杨俊康说,“即便很多人去书店不是奔着书,而是拍照去的,但最起码他奔着书店去了。书店成为了一个‘可以去、愿意去’的地方,谁知道下个周末他会不会带着朋友一起来呢?”

在刘颖看来,实体书店的价值,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第四空间。“如果说家是第一空间,公司、学校等工作或学习的场所是第二空间,商场、咖啡馆等娱乐场所是第三空间,那么公共文化空间就应该是第四空间。它给了人们在日常琐事之外享受文化、启迪创意的地方,然而当下人们进入第四空间的机会还是比较缺乏的。”

钟书阁的大门处写着:“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这也是刘颖认为关于实体书店生存的重要问题。“读者为什么愿意来到这里?他们在这儿消费的是什么?这是实体书店业态转型的过程中,首先要追问的两个问题。”

“很难想象,北京这样一座城市,没有书店会是什么样子。虽然有政府的政策支持,但实体书店能否真正存活下来,最终还是取决于读者需求是否被充分释放,也考验着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刘颖说。

“两种文化”大家谈⑩

## 让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人文

■张亚辉

斯诺反复强调,科学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甚至举出了特洛布里恩德群岛这样全世界都十分陌生的地名来说明自己的意思,他当然是对的。就像中南美洲的甘蔗种植园最终通过糖塑造了西方无产阶级的文化一样,科学是一个现代世界独有的认识和描述世界的手段。它的起源仍旧隐藏在现代社会开端的迷雾当中,但毫无疑问,科学已经成为和糖一样的塑造现代文化最强有力的因素之一。而且斯诺也发现,那个时代大部分的科学家都带有左翼思想,且出身低微,也就是来自靠糖过日子的阶层,这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巧合。

不太夸张地说,斯诺对人文学不接受科学作为一种现代文化颇多微词,他长篇大论的核心意旨即在于说明,人文学应接受并理解科学的意义,承认科学的力量,否则就会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消极力量。唯有科学才能解决现代世界最棘手的问题,即富国与穷国的差异带来的普遍危机。这种充满功利主义的想法虽然让人觉得不那么优美,却非常有力量。相比之下,人们更加津津乐道的核危机,以及科学发展带来的种种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问题,在斯诺看来没什么像样的价值。斯诺的演讲像极了那个对由科学所主导的黄金时代的神话学宣言,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高效率运转的官僚制度和高度发达的科学主导了一切,而要达到这样一种科学主义的乌托邦,科学家首先要成为人文学者积极描述的人格样板。

不论科学如何在近代历史中发生并获得了支配地位,不可否认的,它都是西欧特有的一种文化,而在两种文化的另一端,人文思想却几乎是世界性的。所以斯诺所描述的两种文化的张力,并非人类的普遍状况,即便在欧洲也是一个非常晚近才发生的问题。笔者在学习物理学的时候,导师是核物理专家,但他同时也教授一门中国文化通论课,虽然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多,

但在西方之外的地方,这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论是斯诺还是韦伯,都将教养与教育的关系区分得过于清晰了,如其所是地认识世界和过一种反思的生活之间并不必然存在那么大的鸿沟。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分析,与其说是知识形态带来的,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在国家运行方面遭遇的困境,或者说是一种彻底而理想的官僚制对于志向不得伸展的愤懑的表达。

在我看来,人文知识分子不懂科学并不是什么太致命的问题,当然如果反科学就另当别论;一个物理学家也未必必要懂四书五经,这就好像一个祭司未必必要同时是一个好会计一样,反之亦然。两者之所以会显得格格不入,是因为他们在争夺某种不可替代的东西。这对斯诺来说,无疑是控制官僚制度的主导精神价值。科学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当然有能力生产更多的食物,但在整个20世纪,世界的不均衡并没有真正得到缓解,斯诺已经注意到了人口问题和民族国家壁垒的提高带来的问题,而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也许就是因为生产太过成功和高效了,这个世界某些人剥夺另外一些人的能力提高了,民族国家带来的问题也似乎远比斯诺推测的更加严重。这些问题也许确实有一部分原因来自我们还过得不够科学。可是,如果我们终究就是这样一种无法彻底科学化的物种,也许对现代人的正确审视和反思才是科学与人文应该携手努力的方向。

在人的培养方面,斯诺对于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持鲜明的批判态度,甚至强烈主张现代教育应该让人在年轻时多接受科学教育。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也亲身经历过,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人文知识是一种更加容易掌握的、不那么困难的知识种类,其间曲折一言难尽。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人文与科学不必急着为自己辩护,更不必为了追求斯诺所主张的两种文化的对话而在教育方

面刻意追求跨学科。多学科联合进行学术研究,在达尔文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是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在教育阶段过度强调跨学科,往往培养出来的并非想象中的通才。

人类社会的每一种形态都不是完美的,我们也注定不可能变得完美。每个社会都有某种程度的精神分裂症,人文与科学的张力,甚至可能还是现代人类社会精神分裂最严重和激烈的形式。正视这种张力,并努力理解它带来的问题,远比在两极之间进行决绝的选择要谨慎得多。一个专注于生产的社会和一个专注于宗教或者武力的社会一样,都是漏洞百出的。科学已经取得了不朽的成绩,就像巫术曾经也取得了不朽的成绩一样。现代人要做的是更加彻底地理解自己的历史处境和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不是把自己当作最成功的人类,我们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还少吗?最近有人宣称人类纪已经到来,这似乎不是什么值得光荣的事,最多不过是表示我们的贪婪有点过头了。斯诺在讨论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时候,有着不可动摇的国家主义立场,这个立场是坚不可摧的吗?或者说,如果这个立场没有这么坚定,他所讨论的问题是否就有多出路了呢?科学的使命不只是为了喂饱那些穷国的平民,还要理解他们对世界的想象,给他们发出声音的机会,让他们在自己的意义上获得体面和尊严,这才是现代人面对古人应该去争取并真正能够获得的尊严。科学与人文善意的对话与合作不是体现在咖啡馆里能否对面而坐,亲切交谈,而是面对一个只有生产者的混乱世界,要各自承担自己的使命。现代人就是这样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许理想的状态是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人文的归人文,科学的归科学,如果暂时做不到或者永远做不到,也不必焦虑——斯诺抱怨在二战时期英国政府的决策机制不够科学,好在德国也差不多是一样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



书店+电影:库布里克书店

库布里克书店的名字来源于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书店及其中的咖啡馆依托艺术电影中心而生,除了丰富的电影书籍之外,还提供电影海报、影碟、唱片等。店内定期举办展览、音乐会、讲座和分享会,是很多文艺青年必去的阅读和休闲空间。

打卡地: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街北区1号院当代MOMA社区T2座底商

书店+音乐:Page One·北京坊店

Page One·北京坊店是24小时营业书店,将中外版经典图书、文创产品、咖啡小食、黑胶体验区、绿植空间、主题课程等元素融为一体。黑胶体验区拥有5000张黑胶唱片,每月策划举办古典音乐和听黑胶课程,是古典乐爱好者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打卡地:北京市西城区廊房头条13号院1号楼

书店+自然:中信·自然书店

玻璃房的构造,纯白色的色调,巨大的圆柱形书架,200个植物标本书挡,11个自然主题书籍,在这里,人们能读到地球生命的故事,也能找到生活与自然的交汇点。

打卡地:北京市延庆区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植物馆屋顶

书店+艺术:RENDEZ-VOUS 遇见之地书店

“RENDEZ-VOUS”,在法语中意为“约会”。一进书店,迎接你的是摆放在展台上的国外原版画册,展台右侧是一面杂志墙,摆放着100多种关于生活、美学、设计的外版杂志。书店不定期举办艺术作品展出、美食美酒品鉴、园艺课程讲座等活动。

打卡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7号北京SKP商城4层

近年来,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颠覆了现实世界,还重塑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技术并不总是作为工具为人类带来知识的扩展、力量的增长和精神的愉悦,事实上,它们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何以为人”,我们如何在技术霸权下维护自身的尊严?

近日,文化纵横杂志社与南都观察联合举办的“一期一会”主题沙龙上,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陈自富从“阿尔法狗”、人类基因编辑技术出发,探讨了关于新技术时代人类与其自身造物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本质与尊严、如何理解新技术革命背后的逻辑等问题。

交流的开始,陈自富就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对技术革命进行人文反思的目的究竟何在?不从事专业科学研究,或者跨专业的工作者,有必要参与吗?

在他看来,任何技术的变革,任何技术革命从发生的缘起到部署,无论是普通大众,还是跨专业的工作者,不仅有对它关注的必要性,还要有充分性。

“对技术革命的人文反思,主要目的是形成和强化人类扩展自身边界时的‘问题意识’,从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关系到技术重新定义人类的反思性。”陈自富表示。

至于为什么要形成这种问题意识,他的解释是,在以寻求知识增长为目的的科学探索和谋求人类平等和幸福的社会科学领域,如何提出问题、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都是驱动人类发展的引擎。

过去,人类已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革命,更确切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智能革命”时期。他提出,“智能革命”存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其实人类很难预测。

相反,具备科学理论基础的科技发展更有规律性,其后果和影响的边界也更容易澄清。技术路线预测相对更为准确。

接下去,他提到的是“智能革命”、人工智能会带来哪些哲学问题。

陈自富说,如果将知识作为人工智能的核心来源,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就会和哲学纠缠在一起,因为知识论本身就是哲学的研究范围。但就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

事实上,更值得探讨的是,人工智能在不少领域展现了压倒性优势,人类会因此承认人工智能在本质上取代或超越了人类吗?

他的看法是,宇宙中并不存在完美的人类定义。如果我们放弃这种本质主义的幻想,将智能或意识这种心理学词汇设想为生物体与环境交互的过程,并将其与人类的定义脱钩,就可以避免陷入人工智能挑战人类定义的困境。

在哲学以外,他还探讨了AI和基因技术应该关注的伦理问题。比如,AI作恶的责任主体是谁?技术人员是否拥有广泛、普遍的决策权?没有过程性因果解释的算法,是否可以用替代人类决策?生殖系基因修饰是否构成对人类生物学的改造?为罕见病开发基因疗法是否值得?

陈自富认为,这些伦理问题其实可以通过一些方法部分消解的。比如,算法公开,关键技术应用需要公开听证或者立法,建立用户、投资者和开发人员的沟通机制;驱除哲学上的本质主义,人类没有绝对的本质,我们只需要在特定的时空维度上讨论当下的人类现状,在这个意义上,生殖系基因修饰是可以得到谨慎支持的;从进化生物学来看,已不能从当前人类分化出更多新物种,而且也不存在筛选出更优越的基因型的自然选择。因此人类的未来更多地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对技术的规划和选择。

从大到基因编辑的人文反思

(胡珉琦)